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塑造政党形象的实践进路

李金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西城 100009)

【摘要】政党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离不开媒介的作用，中共中央机关报刊是塑造传播党的形象的重要媒介。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新闻封锁和形象污蔑，中国共产党在舆论阵地上展现出高度的历史主动性：在“破”的层面，中国共产党利用机关报刊开展话语博弈反击形象污蔑，以战斗性的舆论斗争破除形象污化；在“立”的层面，依托重要历史节点刊发纪念文本，以周期性的记忆建构确立形象标识；在“证”的层面，引入国际友人的客观视角，以开放性的多方印证增强形象认同。这一“破—立—证”的系统进路维护并塑造了真实立体的党的形象，为赢得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与精神力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延安时期；政党形象

【中图分类号】D231;G21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25)05-0115-11

DOI:10.16223/j.cnki.cn61-1456/c.2025.05.004

党的形象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是政党内在本质和外在表征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形象建设，既在自我锻造中提高党的形象的先进性，又在媒介传播中强化党的形象的自塑性，以内外兼修的合力向外界呈现出客观、全面、真实的政党形象。中共中央机关报刊是塑造和维护党的形象的坚强阵地，尤其是在以纸质媒体为主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对党的形象塑造与传播至关重要。延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的新闻封锁和形象污蔑致使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知十分模糊且存有诸多误解，这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利用媒介建构和传播自身良好形象。在这一

时代背景下，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解放》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充分发挥了思想武器和革命阵地的作用，通过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向国内外勾勒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扩大了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近年来，关于延安时期机关报刊对党的形象塑造成为新的研究关注点^①。已有研究或聚焦机关报刊对领袖形象、英雄形象等个体形象的塑造，或关注机关报刊对党的整体形象的塑造，但对于机关报刊如何塑造党的形象的问题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当下，考察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塑造党的形象路径问题是强化历史记忆、坚定历史自信的应有之义，具有一定的理论价

【收稿日期】2025-06-21

【作者简介】李金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创新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深刻内涵与体制机制研究”（24ZDA103）。

值和现实意义。

一、开展话语博弈反击形象污蔑

话语是塑造形象的基本介质，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的宣传话语是维护和塑造党的形象的重要资源。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散布谣言污化歪解中国共产党，限制共产党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紧迫舆论环境，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必须在意识形态交锋和话语挑战中建构和传播党自身的话语和理论。中共中央机关报刊是中国共产党在新闻封锁中实现话语突围的有力武器，在舆论交锋中党的机关报刊勇于开展卓有成效的话语争夺，破除形象污化，牢固坚守舆论阵地，最大限度实现党的形象“自塑”。

延安时期，国内反动分子采用话语攻势污蔑诋毁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中国共产党打造成“叛国者”和“暴力分子”，以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这些反动分子的话语攻势按主体划分可分为：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攻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攻势。对此，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夺话语权，突破话语攻势，反击形象污蔑。

（一）反击投降派“共同防共”和“和平建国”的话语攻势

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攻势体现在，一方面，鼓吹以“共同防共”原则取消共产党。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布通电公开投敌叛国，在所发表的通电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共同防共”。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附和日本提出的“共同防共”的原则，他们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1] 254}，借此旗号叫嚣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边区、取消共产党在民众运动中的工作、取消共产主义、放弃其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力求以此类宣传转移全国抗日反汪的注意。另

一方面，鼓吹以“和平建国”原则抨击共产党。汪精卫在《三民周刊》中公然污蔑中国共产党“只知有第三国际，不知有中国”“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2]，并将八路军打击各地伪政权的行为认定为“八路军妨碍国家之统一”^[3]。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大肆叫嚣“反共”，“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军、政、人民施行其最卑鄙的侮蔑”^{[4] 151}，本质目的在于挑拨中国内部团结，最终服务于日本侵略者“以华制华”的殖民图谋。汪精卫的卖国投敌和污化中国共产党的阴谋昭然若揭，严重危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中共中央机关报刊作为揭露一切反动投降派阴谋的武器与阵地，面对汪精卫投降派的污蔑积极承担起讨汪斗争的艰巨责任，有力反击投降派“共同防共”和“和平建国”的话语攻势。

对此，中共中央机关报刊《新中华报》开辟多个讨汪专栏，通过刊发社论、专论、代论、漫画、口号、歌谣等多种形式全面揭露汪精卫等投敌的一切黑暗丑态，“对万恶的敌寇，汉奸，亲日派及一切反动势力阴谋诡计的行为，将予以无情的暴露与打击。”^[5]使得日寇汉奸投降派亲日派反共摩擦分子“都是惧怕这个报纸，切齿痛恨这个报纸”^[6]。首先，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立场。毛泽东尖锐指出，投降派“雪片一样的制造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与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割据与向外扩展，共产党大发展与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群众的眼目”，“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7]，深刻揭露了投降派的谎言与阴谋。中共中央机关报刊还将汪精卫之流称为“汪逆”，将其建立的伪政权称为“傀儡政府”，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讨汪的政治立场。在《新中华报》刊发的《反对汪逆伪“中央政府”》一文中，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坚决维护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反对日寇御用

的汪逆傀儡政府及其他一切汉奸卖国贼，彻底实行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加紧全国各界人民及各抗日党派的团结。《新中华报》还发表《敌后抗战的团结问题》（1939年2月16日）、《加紧团结反对枪口对内》（1940年4月8日）、《讨汪拥蒋，团结抗战》（1940年4月12日）等文章或社论，可见“加紧团结”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尤为关键的政治话语。其次，阐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的真实目的。中央机关报刊发文表示，“日寇灭亡中国的根本政策，是始终不变的”^[8]，指明了日寇的根本目的。《新中华报》还刊登了日本公开的诱降计划，指出“日政府正式承认汪政权为‘中央政府’后，亦未放弃促使蒋介石‘反醒’而与汪政权合流之希望”，“由此可见，日寇配合中国亲日派内战外和的投降阴谋，正在努力加紧其诱降逼诱之活动”^[9]。以此为基础，《打破日本强盗的新阴谋》《日本法西斯的贪欲及其侵略方法》《日本是什么样的帝国主义？》等文章也以锋利的笔触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最后，号召人民群众参与讨汪运动。1940年2月1日，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延安民众举行讨汪拥蒋大会，用歌曲和口号的方式表达“反对汪逆精卫卖国密约”^[10]，触目惊心的口号标语体现了群众的激怒情绪和抗战的坚决意志。《新中华报》还刊登多条民众的示威大会电文表达民众讨汪意愿。甘泉民众大会向全国致电，“我们警告这些亲日派阴谋家，你们已闹到这样地步，这是你们的最后关头了”，“我们深信这些亲日分子民族败类必然滚开”^[11]，绥德民众示威大会致电全国“坚持民族革命战争，与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奋斗到底”^[12]。以《新中华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在讨汪斗争中发挥了武器阵地作用，充分展示了舆论武器的引导和传播功能。

（二）反击顽固派新闻封锁和形象污化的话语攻势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派不仅查禁、封锁、取缔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媒介，还发起舆论攻势

诋毁中国共产党形象。延安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军事围剿”革命根据地的同时，还在文化领域进行“文化围剿”。1939年蒋介石秘密发布《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宣称，“共党在各地不得有任何公开或秘密之组织……否则一经发现，即以战时非常活动论罪”，并要求“共党应即停止违反本党政策之种种荒谬宣传及共产主义思想之传播”，“共党不得单独设立机关报与杂志”^{[13] 350-351}。在1939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国民党将过去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政策，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国民党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和《剿办冒称抗日军的命令》。该时期，国民政府为强化意识形态统治、将话语权纳入其一党管制之下，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法规，严厉限制新闻出版自由，新闻统治日趋严苛。除了新闻上的封锁，国民党肆意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进一步加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统治。同时加紧制造反共谣言，大肆宣扬诽谤中国共产党“游而不击”^[14]、“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15] 89}，故意破坏中国共产党形象。正如外国记者笔下记录的，国民党用“强占国土、袭击国军或破坏抗战”^{[16] 1}的话语形容中国共产党。《解放日报》也严正指出，“国民党一切大小报纸刊物无时无刻不在辱骂共产党”^[17]。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诋毁和攻击，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鲜明指出，“多年以来，中国反动分子造谣生事，蒙蔽舆论，不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暴露于世”^[18]。对此《纽约日报》驻华记者埃德加·斯诺也曾写道，“除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封锁以外，在重庆还有严格和高效率的新闻封锁。一九三九年以来，垄断中国对外宣传的国民党宣传部禁止了几乎一切关于十八集团军的活动的消息。”^{[19] 403}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在话语形式上的封锁和话语内容上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机关

报刊开展有力的话语博弈，反击形象污蔑。在机关报刊发行上，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刊《新华日报》和《群众》以笔为枪，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舆论场进行话语争夺的重要战场，通过组建自己的发行队伍、伪装发行、分散邮寄等方式力求突破国民党当局的检查与封锁，并且创造了“违检”“拒检”“暴检”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②，勇于突破新闻封锁发出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在话语反击上，打破“游而不击”谣言、揭露国民党极力反共破坏团结真相是中央机关报刊进行话语博弈的重点内容。在应对“游而不击”谣言中，中国共产党用真实战绩粉碎国民党谣言。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此作出部署指出应该集中于我军在敌后抗战之英勇壮烈，“借以击破游而不击、封建割据及交出军队、政权之类的反动宣传”^{[20] 329}。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常以大量详实的数据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解放日报》报道冀中游击队一年来战斗统计，战斗3573次，毙伤敌9865名，俘虏伪军344名，争取伪军反正300名，缴步枪887支，手枪38支，小炮51门，轻机枪21挺，自行车547辆，战马63匹，破路2376次，获电杆8849根，电线350 014斤，炸桥297座^[21]。1941年7月22日《解放日报》报道《一二〇师、新军、地方游击队一年来辉煌战绩战斗一〇二四次伤毙敌一三六四〇名》。此类详实的数据报道粉碎了国民党关于“游而不击”的谣言。在揭露国民党极力反共破坏团结真相中，中国共产党勇于揭露国民党污化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行径。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面对国民党企图掀起内战的危局，毛泽东运用宣传舆论手段加以应对，并为《解放日报》撰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一文。社论质问国民党“在第三国际解散之后所忙得不可开交的，单单就在于图谋‘解散’共产党，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汉奸党与敌人党”^[22]。社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惩办汉奸卖国贼，而极力反共、破坏团结抗战和准

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径，提出最为严正的质问和抗议。毛泽东这篇鞭辟入里、态度鲜明的社论在国内国际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对粉碎国民党反共内战阴谋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发布纪念文本建构形象标识

在反击投降派和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国共产党形象污蔑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借助重要历史节点开展纪念活动，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共鸣，提高形象“自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周年纪念是纪念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最常见最有影响的形式”，“人们经常利用周年纪念来重温他们认为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事件”^{[23] 240}。开展周期性纪念活动是塑造党的形象的重要方式。在纪念活动的形式中，文本纪念是最为常见、运作成本低、传播范围广的纪念形式，其中，在报刊中刊发纪念文章又是最为普遍运用的形式。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充分发挥其文本纪念的独特优势，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追忆和缅怀，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主动建构。这一阶段，与建构政党形象密切相关且成为常态化的纪念活动便是建党纪念和抗日战争纪念，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刊发的纪念文本旨在通过不断重申先锋性质号召与鼓舞全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积极承担起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历史重任。

（一）以“团结抗战”为标识的民族先锋形象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抗战的倡导者与领导者，“团结抗战”成为党的民族先锋形象的首要标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和巩固，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延安时期尤其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刊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以宣传维护和巩固国共合作为重点，以宣传鼓动各阶层各方面抗日救亡运动为依托，注重驳斥和揭露反共顽固势力。在这一点上，中共中央在

国统区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主张团结抗战、维护统一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新华日报》刊载中共中央致蒋介石和全国抗战将士的通电，宣示将“号召全党同志，立于抗战之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24] 1939年“七七”抗战二周年《新华日报》纪念特刊中发表了毛泽东《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25]，凸显了团结抗战的信念。1940年《新华日报》的“七七”纪念社论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浪潮尖锐指出，“全国同胞今天所最关心的，是反对妥协投降”“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团结有任何一点的破坏和危害”^[26]。周恩来于1941年7月7日在《新华日报》刊发的纪念文章中强调，“敌人封锁我们，我们加强生产，自力更生。敌人轰炸我们，我们不怕炸，不怕烧，要从焦土中建起新中国”^[27]。同一期第二版的中心位置刊发了毛泽东所提“团结”二字，更为彰显了团结抗战的意志决心。1942年中共中央为抗战五周年纪念发表宣言指出，“在团结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28] 1943年的“七七”纪念发表了题为《健步踏入抗战的第七个年头》的社论，高度强调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团结是抗战的根本条件，也是抗战能够坚持下去的根本条件，更是抗战致胜的根本条件”^[29]。1944年的“七七”纪念再次重申，“今天中国局势的关键，在于国内国际一切抗日力量的民主合作”^[30]。1945年全国人民在迎接抗战胜利中来到了抗日战争的八周年，《新华日报》以《民主，团结，进步迎接胜利的明天》为题发表社论，强调“走民主的道路，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国抗日的力量，这就是形成统一的中国的唯一办法”^[31]。纵观《新华日报》的“七七”纪念文章，无论是处于国民党反共高潮中，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逼

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握抗战纪念的关键时间节点，高举“团结”和“抗战”旗帜，鲜明刻画出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形象标识。

（二）以“大党”为标识的政治先锋形象

党的规模是党的发展与巩固的一项关键指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狭小范围的党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大党，党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大党”的形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建党纪念文本中得到深化。1942年《解放日报》发表朱德《纪念党的二十一年》一文就对党成为大党进行了论述，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有八十万党员的全国性的大政党，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与布尔什维克的党”“今天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小的范围……负担着伟大的革命任务”^[32]。“大政党”“走出狭小范围”都是对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标识的表达。194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干部晚会上的讲话——《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发表于两日后的《解放日报》，成为专门的纪念文章。文章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前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的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却已经成了这样的大政党”^[33]。1944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创立二十三周年》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由一个几十个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政党”，它现在已有九十余万党员，“二十三年中，中国共产党经过了历史的最严格的考验。在这些考验中，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所迫切需要与衷心拥护的。”^[34] 系列纪念文章旨在强调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变化历程，这种“大”既是政党体量上的庞大，也是党所肩负时代任务的伟大，党的使命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先锋队，通过建设大党来改善工作、领导工作。

（三）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为标识的理论先锋形象

理论上的先进才能实现实践上的先进，中

国共产党先锋形象关键在于有科学思想的指导。党的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建党纪念中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是建构先锋形象的关键举措。1945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四周年》社论指出，党的七大通过的新的党章上明确规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简单的话，表示了什么呢？它表示了：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的时期……它也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它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更加进一步结合了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更加自觉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35]，纪念文本进一步诠释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所在。1946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长篇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这篇社论的核心词便是“毛泽东思想”。文章指出，“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人民最高智慧的集中，没有这种思想的指导，人民就不能达到解放的目的，因此，学习毛泽东思想，正如我们党章所规定的，乃是我们党员第一条义务”。社论还认为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程度直接决定着为人民服务所贡献的程度。在社论结尾处，高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的救星毛泽东万岁！”^[36]更加凸显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标识的中国共产党先锋形象。

（四）以引领“整风与生产”为标识的实践先锋形象

中国共产党先锋形象落脚于引领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物质生活的发展。作为“整个的革命链条”^[37]¹¹⁰⁸中的两个环子，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不仅是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所在年份中建党纪念和抗战纪念重点涉及的内容。在整风运动方面，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在建党纪念的重要时间节点加强党的建设。在延安整风运动前，1940年《解放》周刊发表了吴玉章的《用自我批评来纪念我党十九周

年和抗战三周年》一文，实现了政治纪念与党建实践双重叙事融合。吴玉章在文章中多处引用列宁关于自我批评的重要论述并鲜明指出，“如果党隐瞒自己的错误，抹杀迫切困难的问题……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自高自大，并开始高枕而卧，那末，党就会不免于灭亡”^[38]。1943年的建党纪念中，毛泽东着重强调了整风运动的重要意义，“继续整风学习运动，发展自我批评，坚决地、彻底地、毫不客气与毫不容情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39]，凸显了先锋队政党克服不良作风的勇气和坚定。在生产运动方面，1943年《解放日报》建党纪念社论指出，“陕甘宁边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论环境说，是比任何地区更加困难，但经验证明了，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抗战依然可以很好地坚持下去，人民依然可以安居乐业，丰衣足食。”^[40]侧面反映出了生产运动的实效和影响。1943年“七一纪念特刊”刊发了邓小平《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指出“抗战初期，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方向，六年来我们就在这个方向下进行‘我们的建设’的工作，经过了无数曲折，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到现在，我们才摸索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使我们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需要，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打击了敌人的掠夺计划，而且为反攻和战后建设做了不少的准备。”^[41]文章还着重对如何开展生产和经济建设进行了经验总结。引领开展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政党的自我反省能力和自力更生能力，引领“整风与生产”的先锋标识得以建构。

三、引入他者视角强化形象认同

形象认同是一个关系范畴，强调客体在对主体的各项活动和成果的整体印象基础上形成的承认和认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话

语博弈中反击形象污蔑、在发布纪念文本中建构形象标识，同时热烈欢迎外国友人进入边区，认知了解并客观报道中国共产党实际情况。中共中央机关报刊通过刊发外国记者等对中国共产党的客观描述实现党的形象“他塑”。“他者”视角的引入使得党的形象不再是自说自话，而实现了从客观的立场、事实的态度、专业的眼光出发如实描述所见所感，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党的形象建构话语来源和结构，有助于澄清、印证党的形象。这些出自他者视角的形象塑造强化了国内国际受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认同。

1944年夏，由国内外各大报刊著名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采访，在同年相隔不长时间的7月22日和8月7日，由驻华美军司令部派遣的美军观察组也分批抵达延安。“他们的访问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侵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包围封锁，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闻和外交战线上的重大胜利”^[42]¹。中共中央对中外记者的接待工作十分重视，并作了周密安排，制定了接待工作的方针政策，要求实事求是向记者介绍中共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党、政、军、民、学各战线的具体政策和实践成绩，并要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中外记者交朋友。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报道了《接见记者团席上毛主席畅谈国内外局势》，这场会谈首先由毛主席致辞，后各位记者代表提问，最后毛主席进行回答。相关问题涉及林伯渠重庆谈判情形、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做些什么等事关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热点问题。对此毛泽东进行了细致回复，指出，“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43]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边区及晋西北战地等地采访考察4月余，对“边区及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民主建设，抗战成绩，搜集材料甚多”^[44]。此后，陆续有多批外国记者进入边区报道边区。这些外国记者经过长期实地考察调研，最终打破了固

有的意识形态藩篱，以客观、专业、真实的态度展示并高度认可了中国共产党和边区的建设成就。他们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刊上刊发或转载的文章对于塑造党的形象、强化形象认同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强化“民主进步”的政治形象认同

外国记者对于陕甘宁边区实行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形式尤为关注并搜集了诸多材料，他们在《解放日报》发表或转载的文章大多涉及到民主政权建设，为强化中国共产党民主形象认同发挥了关键作用。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冈瑟·斯坦因在《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一文中指出，在边区各级行政区的委员会中三分之二的席位是非共产党员，共产党使这些爱国商人和开明士绅有政治权力和职守，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要求，而这在国民党区是完全做不到的，“同一类型的觉悟农民，爱国的地主、商人和开明士绅，在国民党区没有政治权利与职守”“但共产党却使他们活跃起来了”^[45]。斯诺在考察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时，从多个维度详细记述了其制度创新与实践特色。他强调该地区“施行一种男女平等与成年人普选权的改良的法律”。具体来看，在参议会设置上，“每一个乡都有它自选的乡参议会，县也是一样”；在选举方式上，“选举是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在选举权上，“每一个人都有被选的自由”；在“三三制”的实行上，“共产党限制其党员在任何由选举而成立的机关中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在廉政建设上，“毛泽东是这一青年十字军的公认政治领袖。他仍旧是两袖清风，一文莫名。”^[46]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针对边区的民主政治情况指出，在边区政府“共产党员只占政府人员三分之一的原则，看来是严格地遵守着的”^[47]，边区政府的各种机构也均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并接受人民监督的，在晋西北由于战争情况缘故只有村和部分区的人员是由选举产生的。《解放日报》还刊发了译自美国

《民族》杂志题为《一九四五年的延安》一文，指出“共产党人重申他们的决心，限制他们自己，在一切行政机关中至多只占三分之一的位置”^[48]。美国军人甚至在家书中写道，“全世界最大的误解（共产党），他们致力的民主政治比我们国内的政治还要好得多！”^[49]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实行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形式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在与国民党的对比中深化了人们对边区民主政权形式的认同。

（二）强化“发展生产”的经济形象认同

武道在历时5个月的采访考察后，充分肯定了陕西、山西两省人民大众生活的进步，他强调“‘丰衣足食’的口号和生产运动的成功，随便你跑到那里去都明明白白看得出来。”^[47]武道描述，在边区每一个人都参加生产运动，除了他们正规的职务之外，都会参与到诸如做木工、种蔬菜谷物、纺纱、捻毛线、酿蜜糖、制酱油等生产活动中。武道还观察到有一个旅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每个月都会在农产品和织布厂的超额中得到一大笔盈余，这笔收益存放在合作社中用作每个士兵战后退伍费用。斯坦因认为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使得“中国某些大的经济问题，似乎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走向解决的途中”^[45]。斯坦因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发展生产进行了阐释，“在完全被封锁的岁月中，已学会了自己解决自己问题”^[50]。《解放日报》还刊发了美国合众社和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对根据地印象的报道。福尔曼强调了根据地军队参加大生产的意义，“日用物品和物资，从衣服到武器，从五金工具到木材，都由八路军直接生产”，“一个这样地自给自助的军队当然一定会获得人民的热烈支持”^[51]。透过外国记者深入细致的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形象得到充分印证，有助于强化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的经济形象认同。

（三）强化“文明有序”的社会形象认同

从总体上讲，外国记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是文明有序的。美国研究远东问题的专家罗辛格在探询访问延安后坦白地说，“延安是中国进步的象征，是中国光明的指针”^[52]。斯诺认为“中国任何部分，都没有比这整个边区动员得更为有效。在七年中，延安政府已在世界上一块最贫穷和落后的地区建立了文明与繁荣的社会生活”^[46]，强调了边区在社会动员、建构秩序上的突出成就。在教育上，斯诺指出这里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设立了四个专科学院。在医疗上，有一个公共卫生机关和多个医院，武道提到“军人公务员完全免费”^[47]。在乡村治理上，斯坦因认为中国的老百姓“已从古老的封建主义被唤醒了。他们智慧地参加着自治，并在事实上证明，中国的老百姓在起来争取民主了”^[50]，并且鸦片烟已经禁绝，娼妓和儿童奴役有效地被禁止，没有一个乞丐，二流子已被改造参加了工作。在城市治理上，“抗战胜利以后两年间，中国共产党曾经占领和管理过张家口、长治、烟台、威海卫、德州、承德、赤峰、安东（今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几十个城市。”^[53]⁷⁶⁹通过考察张家口、哈尔滨、齐齐哈尔，美国著名作家斯特朗直言，“中国共产党能建设管理好农村，也已经能建设管理城市和掌握近代交通”^[52]。在言论出版自由上，武道指出边区“在某种限度之内，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47]。外国记者的报道涉及边区生活的多方面甚至提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分城市建设，为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引领中国农村建设和城市建设提供了有力依据。

（四）强化“善战守纪”的军事形象认同

从军队的优良作风上看，斯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军队遵守纪律和实行民主的作风，“军队的士气之所以特别旺盛，与其说是由于什么政治宣传，不如说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守纪律与民主的作风”^[46]。斯诺在《六千万被忘掉了的同

盟者》一文中专门围绕“武装的民主”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作战军队的实际情况，标题中的“同盟者”所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六千万已被解放的人民，斯诺认为这是美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者。在文章结尾，斯诺再次强调，“我们仍然与有助于我们的千百万同盟军隔绝，日寇则因取得时间和增加力量而得利了”^[46]，这从侧面体现出斯诺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能战善战的认可。从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上看，斯坦因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中国吃得最好，最受人爱戴的军队”^[45]。斯诺指出，“十八集团军中没有一个人是在战争中赚钱的”^[46]，官兵过着同样的生活，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军服。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谈到老乡们迎接王震将军部队好像“迎接自己的亲人一样”，“大家狂欢地喊着震撼天地的欢迎口号……我体味了‘军民一家’这个言语的实际内容”^[52]。官兵平等、军民和睦在外国记者的笔下得到了证明。从军队作战能力上看，1945年1月26日，《解放日报》刊发了伦敦《泰晤士报》对中国解放区进行赞扬的文章，认为“在华北地区，现在存在有共产党建立起来的以地方民主政府形式为基础的政权系统。他们在困难的环境下厉行军事生产，军队和群众用他们的双手来制造抗战的工具”^[54]。一位外国记者自延安回国后，面对所听到“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鬼子”的诽谤，郑重的保证“他们确实在打鬼子”，“农人们正由八路军教导着怎样射击，怎样埋雷”^[55]。武道描写了晋西北军民强烈的抗战意志，在有些区域距离敌人只有几英里远的晋西北每一个人都有和敌人斗争的强烈愿望，“老百姓用各种的方式和军队合作，帮助看护和撤退受伤的士兵。他们也独立地攻击敌人坚强的据点，在许多场合，他们在村庄的周围埋下如此之多的地雷，使敌人不敢走进去”^[47]。武道还对亲眼见到的受伤和阵亡的中国士兵、与被俘敌军伪军谈话等细节进行了阐述，这些细节的刻画描写为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

四军对敌作战情况提供了独特视角，有助于强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善战守纪军队的形象认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56]^[58]的对外政策，主动邀请外国记者对党领导军民的抗战情况、生产情况、生活情况进行客观报道，贫瘠荒凉的中国西北一角开始吸引世界的目光。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积极刊发和转载外国记者的报道、文章，有力戳穿了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针对共产党的种种谣言和诽谤，不仅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民主进步、发展生产、文明有序、善战守纪的真实形象，更从“他者”视角强化并印证了党的光辉形象的真实性，对于增强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认同起到了关键作用。

结语

塑造和传播党的形象需要有媒体作为“中介”和“载体”。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运用党的媒体建构、塑造、传播、维护党的形象，对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了广泛宣传，记录并展现了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辛奋斗的历史过程，向党内外、国内外呈现了立体、真实、客观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尤其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报刊发行体系，探索出了系统化的政党形象塑造进路，即积极运用中央机关报刊破除形象污蔑，勇敢地揭露和批判敌对势力的阴谋与暴行；在重要历史节点刊发纪念文章，塑造传播自身团结抗战、队伍壮大、理论科学、自力更生的政党形象；刊发国际友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客观描述，强化国内国际受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认同。这些实践举措成效显著，凝结出延安时期党运用中央机关报刊塑造政党形象的宝贵经验，值得倍加珍惜、不断发展。

当今世界对中国之治和中国共产党之治的

关注度不断攀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瞩目的焦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也自然会成为各种舆论的“焦点”。如何更好地运用党报党刊党媒塑造党的形象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要议题。现阶段，需充分汲取延安时期中央机关报刊塑造党的形象的有益实践经验，为新时代塑造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提供载体支持。

注释：

- ①相关研究成果，如：周海燕：《吴满有：从记忆到遗忘——〈解放日报〉首个“典型报道”的新闻生产与社会记忆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许冲：《形象建构与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以〈解放日报〉为中心的考察》，《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邱跃强：《图像视角下延安时期党员形象初探——以〈解放日报〉为中心来考察》，《文艺论坛》2021年第4期；王晓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报刊对党的形象构建研究》，《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高晓林、刘阳科：《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洁形象的建构及其启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杨红运：《延安时期外国记者笔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及意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8期；郝智浩：《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建构党的形象探究》，《中国教育学刊》2025年第7期等。
- ②国民党新闻检查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异己思想特别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维护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而且规定繁杂苛细、形式原始落后、检查人员素质极其低下，因而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新闻界的抵制和反对。在这一斗争中，《新华日报》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创造了“违检”“拒检”“暴检”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得到了新闻界的赞同和支持。参见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1927—1949）》，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参考文献：

-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1)[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 [2]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J].三民周刊，1939(1).
- [3]王稼祥.回答破坏统一团结的阴谋[N].新中华报，1939-02-10.
- [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5]纪念本报新刊两周年[N].新中华报，1941-02-06.

- [6]凯丰.新中华报的两周年[N].新中华报，1941-02-06.
- [7]毛泽东.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N].新中华报，1939-07-07.
- [8]王明.坚持抗战国策 克服投降危险[N].新中华报，1939-07-07.
- [9]松冈公开诱降计划 愿否认汪精卫政权以促成蒋介石投降 国人应急起打击亲日派阴谋[N].新中华报，1941-02-06.
- [10]万众振臂怒吼中举行了延安民众讨汪拥蒋大会[N].新中华报，1940-02-03.
- [11]甘泉民众大会致全国通电[N].新中华报，1941-02-06.
- [12]绥德民众示威大会电[N].新中华报，1941-02-06.
- [13]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G].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14]八路军致林主席蒋委员长等电[N].新中华报，1940-01-20.
- [15]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16]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M].陶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 [17]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N].解放日报，1943-10-05.
- [1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N].解放日报，1945-05-02.
- [19]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 [2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1]冀中游击队一年来战斗统计[N].解放日报，1941-06-16.
- [22]社论.质问国民党[N].解放日报，1943-07-12.
- [23]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杜继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24]中共中央电慰 蒋委员长暨全国抗战将士[N].新华日报，1938-07-09.
- [25]毛泽东.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N].新华日报，1939-07-07.
- [26]社论.纪念神圣抗战三周年[N].新华日报，1940-07-07.
- [27]周恩来.“七七”四年[N].新华日报，1941-07-07.
- [28]社论.为抗战五周年纪念中共中央宣言[N].新华日报，1942-07-07.
- [29]社论.健步踏入抗战的第七个年头[N].新华日报，1943-07-07.
- [30]社论.加强作战努力，争取最后胜利！“七七”抗战七周年纪念[N].新华日报，1944-07-07.
- [31]社论.民主，团结，进步 迎接胜利的明天[N].新华日报，1945-07-07.
- [32]朱德.纪念党的二十一年[N].解放日报，1942-07-01.
- [33]毛泽东同志总结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N].解放日报，1943-07-03.

- [34]社论.中国共产党创立二十三周年[N].解放日报,1944-07-01.
- [35]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四周年[N].解放日报,1945-07-01.
- [36]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N].解放日报,1946-07-01.
- [3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8]吴玉章.用自我批评来纪念我党十九周年和抗战三周年[J].解放,1940(111).
- [3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N].解放日报,1943-07-02.
- [40]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N].解放日报,1943-07-01.
- [41]邓小平.太行区的经济建设[N].解放日报,1943-07-02.
- [4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 [43]接见记者团席上毛主席畅谈国内外局势[N].解放日报,1944-06-13.
- [44]外国记者团离延返渝[N].解放日报,1944-10-25.
- [45]斯坦因.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N].解放日报,1946-04-05.
- [46]斯诺.六千万被忘掉了的同盟者[N].解放日报,1944-08-17,1944-08-18.
- [47]武道.我从陕北回来[N].解放日报,1944-11-13.
- [48]派西福拉斯.一九四五年的延安[N].解放日报,1945-05-11.
- [49]美军家书中的新四军和解放区[N].解放日报,1945-12-20.
- [50]斯坦因.远东民主的种子[N].解放日报,1945-06-04.
- [51]美记者福尔曼报道对我根据地印象[N].解放日报,1945-03-15.
- [52]张香山,孙铭.外国记者看延安[N].解放日报,1946-11-10.
- [53]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4]伦敦泰晤士报揭载长文赞扬中国解放区[N].解放日报,1945-01-26.
- [55]布士.我从中国解放区回来[N].解放日报,1945-07-04.
- [56]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赵春】

Image-Building Endeavors of the CPC Central Official Press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LI Jinling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cheng,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Media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shaping and communicating a political party's image, and the official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ve served as crucial vehicles for shaping and spreading the Party's image.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facing the news blockade and slanders imposed by the Kuomintang hardliner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isplayed a keen sense of historical initiative in the fight of public opinions. To "break" the stigmatization, the CPC utilized its official publications to engage in discourse debates, refuted and shattered the stigmatization via battles on public opinions. To "shape" its image, the Party timely published commemorative articles on important historical moments or events, so as to enhance its positive image through periodic memory building. To "prove" its image, the Party resorted to the objectiv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enhancing its image identity through open and inclusive confirmation.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upheld and shaped an authentic and multidimensional image of the Party, winning it a strong public opinion support and spiritual strength, which helped it secure the victorie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official pres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Yan'an period; image of a political party